

*China's Stefan Zweig: The Dynamics of Cross-Cultural Reception.* By Arnhilt Johanna Hoefle.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8. Pp. xi + 210. \$68.00.

二十世紀比較文學發展最重要的面向之一，是從「影響研究」到「接受研究」的重點轉移。在跨文化脈絡之下，異國文學的接受研究關注物質性的「文本置換」過程，包括作家的著作如何通過書籍、報刊雜誌等印刷媒體被另一地域文化的群體所選擇、閱讀、翻譯、評論以至被異地的作家吸納進入他們的寫作。學者揉合近年文化翻譯的理論以及「文學場域」等文藝社會學的分析方法，進而探究文學作品如何因應不同時代地域的政治和歷史發展，產生極端相異的解讀和詮釋。奧地利學者霍佛 (Arnhilt Johanna Hoefle) 新近出版的專著《中國的茨威格：跨文化接受的動力學》，<sup>1</sup> 正針對過往比較文學偏重文本對比的方法以及德國康士坦斯學派 (Konstanz School) 傳統接受美學單向關注接受一方的不足，並參考八十年代以降德、法學者有關「文化轉移」(cultural transfer) 的理論，重新強調文化系統的流動本質以及不同文化體系之間互動、互滲的特點，以期在文化轉移的全球網絡下重新考察文學跨國性的發展 (頁 11-16)。

本書聚焦探討奧地利猶太裔德語作家茨威格 (Stefan Zweig, 1881-1942) ——一位在本國以至整個歐美文壇曾備受批評甚至嚴重忽視的作家，如何跨越多重時間、地域、語言和文化邊界進入亞洲，並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獲得各種不同的解讀，成為享負盛名的西方作家，其影響力維持至今。本書研究中國對茨威格的跨文化接受，自 1921 年由中國著名左翼作家茅盾 (1896-1981) 首次引介，至 2013 年中國當代先鋒導演孟京輝將其小說搬演舞台，時距橫跨接近一個世紀。在此期間中國經歷巨大的政治變化，茨威格的小說、散文、傳記、戲劇等中文翻譯卻綿延不絕，其中短篇小說《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Brief einer Unbekannten*, 1922) 的翻譯、影視和戲劇改編更是歷久不衰。茨威格在中國複雜的接受情況並非從未受到中國學界的關注，但相對完備、橫跨百年的接受研究始終缺乏。本書考掘大量的中文原始材料，著力辯析接受過程中可能涉及的各種西方思潮和文化資源，填補了二十世紀中國對德語文學接受研究的重要板塊，意義深遠。

本書作者從兩方面說明研究對象的獨特性：其一，從二十世紀德語文學在中國的接受情況而言，茨威格著作的中文翻譯數量僅次於德國文學巨擘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相對於 1949 年以前備受關注的另一位奧地利德語

<sup>1</sup> 霍佛 2014 年獲英國倫敦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學位，現任維也納大學講師以及奧地利國家圖書館研究員。本書是她博士論文延續研究的成果，之前作者亦曾就茨威格與中國的論題發表論文，見 Arnhilt Joanna Hoefle, "Habsburg Nostalgia and the Occidental Other: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Stefan Zweig's Novellas," *Journal of Austrian Studies* 47, no. 2 (June 2014), pp. 105-30; idem, "Stefan Zweig in China," in Rüdiger Görner and Klemens Renoldner, eds., *Zweigs England*. Schriftenreihe des Stefan Zweig Centre Salzburg, Band 5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2014), pp. 161-68。

作家施尼茨勒 (Arthur Schnitzler, 1862–1931) 以及 1949 年以後始譯介至中國的捷克德語小說家卡夫卡 (Franz Kafka, 1883–1924)，中國學者對茨威格的譯介自二十年代起持續百年，從未間斷。換言之，不論從著作翻譯數量還是從作家受關注的持續程度而言，茨威格都是二十世紀進入中國讀者視野的重要德語作家。其二，茨威格的著作至今雖已有超過六十種語言的翻譯，然而過去一個世紀歐洲和北美國家對他的接受和評價都異常分化。本書特別比較了奧、法、英、蘇和巴西等與茨威格有緊密關係的國家對其作品的翻譯及研究情況，綜合分析他從廣為人知、備受稱許的作家 (二、三十年代) 漸次成為被遺忘的名字 (四十至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茨威格的翻譯和研究又再度復興。縱使茨威格廣受歡迎，但不少同代的評論家貶抑其文學作品虛假、沉迷感傷而過於雕飾，甚至批評他宣稱不干預政治的姿態。本書比對茨威格在中國的接受情況，從而指出中國對茨威格的解讀展現出與全球脈絡截然不同的詮釋方向。作者據茨威格的回憶錄《昨日的世界》 (*Die Welt von Gestern*, 1942) 進一步分析，早於三十年代茨威格已得悉自己著作出版了中文翻譯，然而他終生不曾到訪中國，作品亦從未以中國為故事背景。由此，作者認為中國對茨威格的引介和持續關注，完全獨立於作家生平及作品與地方的連繫，是以「中國的茨威格」提供了具說服力的案例，說明中國自身語境在跨文化的接受過程中產生的特殊作用。

本書共五章，首章為引言，此後分為兩個部份，分別探討 1949 年前後茨威格在中國的接受情況。第一部份以「茨威格與現代中國的形成 (1921–1949)」 (Stefan Zwei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1921–1949)) 為題，選取了三種茨威格文學作品的中文翻譯：1927 年耿濟之 (1899–1947) 從俄文轉譯的《保姆》 (*Die Gouvernante*, 1911；今譯《家庭女教師》)、1933 年章衣萍 (1902–1947) 從英文轉譯的《一個婦人的情書》 (*Brief einer Unbekannten*, 1922)，以及 1934–1935 年間孫寒冰 (1903–1940) 據同一英譯本轉譯的《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作為分析民國時期茨威格接受研究的切入點。上述三種翻譯均是轉譯文本，茨威格的德語原著通過第二語言及文化 (俄、英) 再進入中國的曲折歷程，為文化轉移的探討提供了偌大的空間。僅就耿濟之從俄文轉譯的《保姆》而言，作者便詳述刊載《保姆》的《東方雜誌》在中國二十年代的位置及文藝取向、俄國自二十世紀初譯介茨威格的歷史語境、譯者耿濟之與俄蘇的關係 (駐蘇的中國外交家、俄國文學翻譯家)、耿濟之選譯傳統俄國文學及翻譯茨威格的整體情況。在此基礎上，作者精細分析耿濟之對《保姆》一篇近二百字的譯介短文，<sup>2</sup> 並與高爾基 (Maxim Gorky, 1868–1936) 為茨威格在俄國出版十二卷作品翻譯所撰寫的序言比對閱讀，從而判斷耿濟之反覆強調茨威格小說裡「愛」的中心主題，明顯源自高爾基的評論。作者進而推論耿濟之以茨威格的短篇作為浪漫主義和心理分析的歐洲文學典範，指出《保姆》「愛」的主題以及「心理描寫」兩方面的特點，正是有意將小說重置於二十世紀初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脈絡，強調小說與重視個人主義的時代精神相合。

<sup>2</sup> 《東方雜誌》第 24 卷第 15 號 (1927 年 8 月 10 日)，頁 118。

跨文化接受研究的個案分析，在大量中外文獻整理之上還需要綿密的邏輯思考和推論，這方面作者的處理都極其細緻。然而書中個案複雜繁多，部份分析仍有斟酌的餘地。譬如作者認為孫寒冰從英文轉譯《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的引介過程，正體現中國日益嚴峻的政治環境下解讀茨威格的一次「政治轉向」。作者強調孫寒冰在小說〈譯序〉詳列所據的英文翻譯版本資料，其實是有意指出英譯者保羅夫婦 (Eden and Cedar Paul) 曾經翻譯馬克思《資本論》(*Das Kapital*, 1867) 的背景以及他們與國際共產主義思潮的聯繫。無可否認，英國作家、翻譯家兼醫師保羅 (Eden Paul, 1865–1944) 曾加入英國共產黨，有鮮明的政治取向。孫寒冰身為經濟學者，也曾鑽研馬克思的經濟學說，著有探討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的《合作主義》，<sup>3</sup>對保羅夫婦所譯的《資本論》絕對不會陌生。但保羅夫婦的政治觀點是否影響《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的閱讀和翻譯，還是需要配合充份例子再作分析。雖然作者多次指出《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德文原著與中文譯本的差異源自英文翻譯 (頁29–30、47–48)，但正如本書往後的分析，英譯對德文原著的改寫都集中於句型、標點或德文原著裡奧地利的人名、學校和咖啡店等專用名稱。<sup>4</sup>由於兩位中譯者章衣萍和孫寒冰謹慎按英譯版本轉譯《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因此譯出文字與原著有明顯差異，但似乎並未足以從意識型態的層面說明譯者政治傾向對小說解讀的具體影響。

本書作者集中對孫寒冰翻譯《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的附錄〈關於《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的兩種不同批評〉——蘇聯評論者 Sergei Dinamov (1901–1939) 和美國評論者 Harold Strauss (1907–1975) 的文章——進行分析。兩篇評論節錄早隨小說翻譯在《世界文學》雜誌上發表，作者沒有直言的是 Sergei Dinamov 文章被編入小說單行本時篇幅大大增長，從不足三百字的期刊節錄版本換成過千字的譯文。<sup>5</sup>可惜的是，至今仍未有充份資料查證此文的原始來源，甚至文章是從俄文直譯還是從英文轉譯，亦未可知。其實三十年代中國文藝雜誌多有刊載 Sergei Dinamov 評論文字的翻譯，僅在孫寒冰發表《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譯文以前便已有〈現代資本主義底文化〉(《清華周刊》)、〈現代資本主義與文學〉(《文學新地》)、〈約翰里德底創作方法〉(《當代文學》) 等文章發表，其中甚至介紹「S. Dinamov 為蘇聯批評家，Moscow Literary Gazette 的

<sup>3</sup> 孫錫麒(孫寒冰):《合作主義》(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年)。

<sup>4</sup> 作者以《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首段為例,比對了德文原著與英文、中文的翻譯版本。為說明保羅夫婦英譯本對原文的改動,作者在註釋中進一步比對近人的英譯本 Stefan Zweig, “Letter from an Unknown Woman” (Brief einer Unbekannten), in *Letter from an Unknown Woman and Other Stories*, trans. Anthea Bell (London: Pushkin Press, 2013), p. 148。順帶指出,本書所引章衣萍對小說首段的中文翻譯,「清早」(early in the morning)一詞誤作「青草」(頁48)。

<sup>5</sup> Stefan Zweig (著)、寒冰(譯):〈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續),《世界文學》第1卷第2期(1934年12月),頁257、259; Stefan Zweig (著)、孫寒冰(譯):《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頁79–83。

編輯和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的總編輯」。<sup>6</sup> 往後他的文章翻譯依然不斷，由此可見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壇對這位蘇聯文評家有一定的認識。

仔細比對孫寒冰撰寫的〈譯序〉以及附載 Sergei Dinamov 的評論翻譯兩者在《世界文學》以及《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單行本裡的不同版本，其中幾點可供作者斟酌參考。本書作者認為一併刊載 Sergei Dinamov 和 Harold Strauss 有關茨威格觀點與評價完全不同的文章，實際上乃針對三十年代國民黨對書籍雜誌出版的政治審查，借助美國評論家對小說的讚揚，以圖掩護蘇聯評論家的文章，從而策略性地引入社會主義的文藝批評。作者進一步指出《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單行本所載孫寒冰的〈譯序〉，對期刊原初版本有關作者激情、性愛等寫作特點的刪改，同樣是迴避審查的策略（頁35-36）。但比對之下不難發現，小說單行本〈譯序〉刪改期刊原初版本的地方，主要針對茨威格描寫現實片面不足及以性愛作為唯一寫作題材等兩方面的批評，<sup>7</sup> 而有關觀點其實來自 Sergei Dinamov 的文章。單行本刊載 Sergei Dinamov 的長篇評論翻譯，對這兩方面均有詳細論述：「他的英雄們無論從何處出發，無論停止在何處，那支配他們動向的刺激只是性。……但性愛並不能使薩伐格〔即茨威格〕的英雄們變成新的男人或新的女人，……性愛雖能擾亂他們有規則的生活方式，但不能動搖他們生存的整個制度。……這一類藝術家的無能，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所看到的那運動並非是運動，而只是更巨大更重要的過程的反映。薩伐格的現實一變而為『自我』，而這個『自我』在他的心目中又變成了現實的全部。」<sup>8</sup> 換言之，孫寒冰對〈譯序〉的刪改，可能為了配合小說單行本刊載 Sergei Dinamov 千字版本的文章，讓評論者的批評觀點更清晰詳細地保留在原文的翻譯之中。

此外，中國三十年代的文壇縱然備受國民政府的政治審查壓力，但呈現的意識型態和文藝傾向仍然多元分化。正如霍佛所指出，孫寒冰是「馬克思主義者」（頁34），但不能忽略在此時期中國知識份子思想上的複雜性。孫寒冰關注 Sergei

<sup>6</sup> Sergei Dinamov (著)、葉林(譯)：〈現代資本主義底文化〉，《清華周刊》第40卷第10期(1933年12月)，頁120-28(譯者自註文章節譯自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第3冊，於同年7月出版)；Serge[i] Dinamov (著)、楊剛(譯)：〈現代資本主義與文學〉，《文學新地》第1期(1934年9月)，頁44-73(譯者自註文章轉譯自英文譯者 Michael L. Korr)；Sergei Dinamov (著)韓起秋(譯)：〈約翰里德底創作方法〉，《當代文學》第1卷第3期(1934年9月)，頁7-20。Sergei Dinamov 介紹附於楊剛所譯〈現代資本主義與文學〉一文。

<sup>7</sup> 孫寒冰譯〈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初次在期刊發表時，附有譯介文字，其中對茨威格的主要批評：「他攻取現實，只捉住了一些零星的外殼。性愛的問題成了他寫作的唯一題材」，在收入單行本時刪去。見 Stefan Zweig (著)、寒冰(譯)：〈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世界文學》第1卷第1期(1934年10月)，頁37-38；孫寒冰：〈譯序〉，載 Stefan Zweig (著)、孫寒冰(譯)：《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頁1-2。

<sup>8</sup> Sergei Dinamov：〈關於《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的兩種不同批評(二)〉，載 Stefan Zweig (著)、孫寒冰(譯)：《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頁81-82。

Dinamov 的評論，除因為文章表現的社會主義文藝觀點，還因為譯者的經濟學者身分以及當時中國經濟學發展的特殊背景。孫寒冰早年赴美，先後於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及哈佛大學修讀經濟學，回國後專門任教政治和經濟。二、三十年代他與其他中國學者引入奧地利學派的經濟理論，與當時主導學界的英美經濟學派論說相抗衡。<sup>9</sup> Sergei Dinamov 的評論正引用了著有《馬克思主義體系之崩潰》(*Zum Abschluss des Marxschen Systems*, 1898)、批判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奧地利經濟學派代表學者龐巴維克 (Eugen von Böhm-Bawerk, 1851–1914) 的觀點。Sergei Dinamov 借龐巴維克對政治經濟學之中社會法則的論述，闡述茨威格作品的人物如何展示一致的世界觀和歷史觀：當作家「將這個世界純粹看作主觀的存在，……現實在他看來亦將成為盲目的和偶然的了。……偶然而非必然是他的英雄們的行為以及他著作中所描寫的一切事件的主動力」。<sup>10</sup> 不過細探文章翻譯的遣詞造句，可見文化轉移過程之中 Sergei Dinamov 文章的中譯者還是因應當時中國左翼文藝的批評角度，<sup>11</sup> 運用特定術語翻譯和詮釋蘇聯評論家的觀點，指出茨威格是現代歐洲「布爾喬亞」階級的作家，並批評他小說的描寫對象都是微小的「幫閒人物」。<sup>12</sup>

相對於三十年代中國文壇首次引入文藝政治化觀點閱讀茨威格的小說，1949 年以後茨威格及其著作在共產中國的政治格局之下被全面政治化解讀，還出現了各種扭曲而意想不到的詮釋方法。本書第二部份「共產主義再讀茨威格 (1949–2013)」(Communist Rereadings of Stefan Zweig (1949–2013))，即重點探討茨威格在 1949 年以後各個歷史關鍵時期文化接受的不同軌跡。霍佛以 1949 年後茨威格首篇小說中譯《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Vierundzwanzig Stunden aus dem Leben einer Frau*, 1927) 為案例，通過譯者紀崑的〈譯後記〉分析他如何在「雙百方針」(1956 年) 和「反右運動」(1957 年) 的政治氛圍之下，為資產階級作家的著作建構「反資產階級」閱讀的策略。一方面，紀崑從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觀點指責茨威格輕視政治，未能把握「社會經濟發展規律與階級鬥爭的現實來認識歷史」，但強調一次大戰以及兩戰期間作家曾參與的各種政治運動，包括支持俄國革命。另一方面，紀崑批評茨威格「世界觀的片面性」，但又肯定他「現實主義」的真正藝術家身分。茨威格的小說首次被讚揚促進社會批判的力量，他描述的女主人公被逆向理解為作家刻意表現資產階級社

<sup>9</sup> 宋濤 (主編)：《20 世紀中國學術大典：經濟學》(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 年)，王志偉撰「當代西方經濟學研究」條，頁 28。

<sup>10</sup> Sergei Dinamov：〈關於《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的兩種不同批評(二)〉，頁 82。

<sup>11</sup> 《世界文學》初載 Sergei Dinamov 評論節錄時譯者署名「其東」，身份不詳，霍佛懷疑這是筆名。《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單行本收錄該文較完整的版本，但沒有列出譯者名字。

<sup>12</sup> 1932 年魯迅於《電影與文藝》創刊號發表〈幫忙文學與幫閒文學〉一文，曾對「那些會念書會下棋會畫畫的人，陪主人念念書，下下棋，畫幾筆畫」的幫閒人物以及相應的幫閒文學加以批評。見魯迅：〈幫忙文學與幫閒文學——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大學第二院講〉，載《集外集拾遺》，收入《魯迅全集》第 7 卷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頁 404。

會婦女的不幸遭遇，心理描寫則被視為有效批判社會虛偽貧乏的生活以及呈現女性處境的手法（頁69–70）。<sup>13</sup>

長年以來，茨威格被視為非政治化的作家。二次大戰期間原籍德國的美籍猶太裔政治理論家鄂蘭 (Hannah Arendt, 1906–1975) 曾據茨威格的回憶錄《昨日的世界》對其不問政治的態度加以責難（頁3）。鄂蘭批評茨威格受著社會恥辱的過度敏感所支配，只關注個人尊嚴，致使他不僅一直政治冷漠，甚至在法西斯掌權的時代仍繼續自誇這種非政治的觀點，無法理解他自身的限制等同「單純的怯懦」(plain cowardice)。鄂蘭認為茨威格被狂熱的崇拜所腐化，只逃到「名聲的象牙塔」(ivory tower of fame) 裡面，卻沒有為猶太族裔的榮譽而戰鬥。<sup>14</sup> 本書作者認為五十年代以降中國對茨威格及其著作的政治解讀，開啟了歐美評論界對茨威格與政治關係研究的新視野。本書亦大量補充了二千年後歐美學者對茨威格政治傾向的不同討論，並準確指出他們重新審視茨威格的政治觀點，主要還是根據茨威格的回憶錄以及發表於一次大戰期間的反戰劇本《耶利米》(*Jeremias: Eine dramatische Dichtung in neun Bildern*, 1917)。相對而言，中國評論家通過茨威格《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等短篇小說解讀當中批判資本主義、推動社會改革力量的做法，從世界文學視野下茨威格的接受情況而言，還是非常特殊的。

事實上，中國知識分子對茨威格的左傾政治思想，早於二十年代初通過茅盾對作家及其傳記著作的首次介紹已經有所認識。無獨有偶，五十年代紀崑發表茨威格的小說翻譯及引入社會主義文藝觀點閱讀茨威格的雜誌《譯文》，同樣是由茅盾擔任主編 (1953–1958)。1920年茅盾接任《小說月報》主編，隨即展開革新，主持「海外文壇消息」欄目並於第76號〈兩本研究羅曼羅蘭的書〉介紹茨威格及其新著《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 Der Mann und das Werk*, 1921)，提及茨威格於1917年發表的非戰劇本《耶利米》受到羅蘭的稱賞。霍佛未有注意的是同期《小說月報》的「海外文壇消息」第82號〈丹麥和奧國的兩個文學家的英譯〉裡，茅盾對茨威格的《燒著的秘密》(*Brennendes Geheimnis*, 1913；今譯《灼人的秘密》) 進行了獨立評介，指小說「是講一個小孩子生活的半截，從心理學方面研究小孩子的心理發展」。<sup>15</sup> 這是首次在中國發表茨威格小說的評論，從而可知茨威格初次進入中國讀者的視野已展示了反戰和心理分析兩方面的寫作方向。茨威格小說的首次翻譯《保姆》(1927年) 發表以前，茅盾已在《小說月報》發表歐戰十週年的紀念文章〈歐洲大戰與文學〉，再次論及茨威格及其反戰文學，稱許《耶利米》是「一篇驚心動魄的傑作」，並讚揚「當別人是在那裡描寫戰爭的罪惡，叫讀者心醉或憤怒的時候，池外西（即茨威格）卻來預言反抗精神

<sup>13</sup> 紀崑：〈《一個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時》譯後記〉，《譯文》1957年9月號，頁45–46。

<sup>14</sup> Hannah Arendt, "Portrait of a Period," *Menorah Journal* 31 (Fall 1943), pp. 307–14.

<sup>15</sup> 沈雁冰：〈海外文壇消息〉，《小說月報》第12卷第7號 (1921年7月)，頁1、5–6。

之終得勝利，叫人家不要灰心」。<sup>16</sup>及至1926年，茨威格《羅曼·羅蘭傳》的翻譯首次在魯迅主編的《莽原》連載。<sup>17</sup>二、三十年代中國左翼作家對茨威格的評介與1949年以後茨威格著作在中國的政治解讀之間的連繫，仍有待探討。由此可見，雖然本書以茨威格文學作品的翻譯過程為分析重心，但他的傳記和反戰文學翻譯在二十世紀中國對茨威格的跨文化接受研究裡依然佔有重要位置，可與本書的研究互相補足。

二十世紀中德文學與文化關係的研究版圖上，中國對茨威格的跨文化接受是方興未艾的課題。本書的主要貢獻並不在於為文學接受與文化轉移的理論建構具操控性的分析方法，而是透過眾多文學翻譯與重寫、改編和再創作，精細分析個案背後所展現不同文學、文化、知識和政治話語的互動關係，展示中外文化轉移的豐富層次和複雜性，為跨文化接受的研究作出一次全面而周延的探討。

鄭可怡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

<sup>16</sup> 沈雁冰：〈歐洲大戰與文學——為歐戰十年紀念而作〉，《小說月報》第15卷第8號（1924年8月），頁15-16；沈雁冰：〈歐洲大戰與文學——為歐戰十年紀念而作〉（續），《小說月報》第15卷第8號（1924年8月），頁82。

<sup>17</sup> 茨威格《羅曼·羅蘭傳》的翻譯於1926年10月開始在《莽原》連載，時魯迅已離開北京，不再直接負責《莽原》的編輯工作，而由韋素園接編，但魯迅一直關注《莽原》的出版。參考Stefan Zweig（著）、張定璜（譯）：〈Romain Rolland〉（一至六），《莽原》第1卷第19-24期（1926年10月10日至12月25日）；吳曉樵：〈茨威格《羅曼·羅蘭》的早期中譯本〉，《新文學史料》2009年第2期，頁160-61。